

杨守敬与《日本访书志》

王承略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出生于商贾世家。幼时白天在肆持筹握算，夜间则潜心诵读。十九岁补诸生。同治壬戌（1862）中举人。光绪庚辰（1880）夏赴日本，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开始在日本收集国内散佚的古籍。不久，遵义黎庶昌接任公使，知道杨氏精于版本目录，委托他校刻《古逸丛书》。丛书收书凡二十六种，绝大多数底本都是国内久佚的宋刊本和日本旧钞卷子本，影刻之精良，不亚于宋槧，对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4年归国后，选黄冈县教谕，调黄州府教授，充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及勤成学堂总教长。光绪癸卯（1903）开经济特科，张之洞奏举杨氏名列第一。辛亥革命后避往上海。1914年，受袁世凯聘为顾问，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政。次年病逝。

杨守敬一生著述宏富。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著有《禹贡本义》一卷、《汉书地理志校补》二卷、《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若干卷、《水经注疏》八十卷等书。其中《水经注疏》用功最深，罗振玉曾高度称赞，说此书纠正全（祖望）、戴（震）、赵（一清）三家之失，创猎真谛，可与王、段之小学，李壬叔之算学，同为千古绝业。

杨氏又是一个有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其版本目录名著就是《日本访书志》。其他关于目录学和版本学的著

作还有《留真谱》初编十二卷续编十二卷、《隋书经籍志补证》四卷、《唐宋类书引用书目》八卷、《藏书绝句》三十二首。其中《留真谱》开我国书影之先河，《藏书绝句》则罕为人知。《藏书绝句》对殿本、公使库本、梵夹本、唐卷子本、足利本、焦尾本等三十二种版本，各作一绝句，叙其特征，并将有关某种版本的原始材料附系于诗后，对于研究版本学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金石方面，著有《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望堂金石》若干卷、《寰宇贞石图》若干卷、《楷法溯源》十八卷续十八卷等。杨氏的藏书数十万卷，一部分是在国内收集的，一部分是在日本购买或影钞的。其中海内孤本的卷数就有一万余卷。不少精品，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该院1977年编的《宋本图录》，收取杨氏从日本购回的珍本，共有十种之多。如宋刻影钞配本《严氏济生方》十卷、宋绍兴间衢州刊本《三国志》六十五卷，都是海内孤本，极为珍贵。

《日本访书志》（以下简称《访书志》）是杨守敬在日本搜购和影钞我国古籍善本书的提要目录。这些书有的是早已失传的孤本，更多的是刻印或传钞较早的本子。因此《访书志》有它特殊重要的价值。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而欲废弃旧学。很多藏书家将古书论斤售卖，损毁了许多日本的和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古籍。但不久他们就认识到，全盘抛弃传统文化是很不理智的行为。杨氏初到日本，书肆对于旧板书还不是很珍重，他就恣意搜购，等他购求不已时，随即引起了好事者的注意，他们重新争相购买，得到一明嘉靖本也视为珍奇。杨氏本来财资有限，又在异国他乡，根本无法同日本收藏家争衡。幸亏他去日本时，携带了许多古碑、古钱、古印，这时他就用来交换图书。他又和一些日本藏书家如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等，结成友好，

使他得以看到并收买这些藏书家的古书。他还通过他们的帮助，从别的藏书家手里借来一些秘籍，加以影钞。就这样，杨氏作了最大努力，能买到的尽量买，只能借阅无法买到的，或详记版本模式，或印入《留真谱》，为后人留下了搜求原书的线索。凡是经眼和买到的书，他都“考其原委，别纸记之，久之得廿余册。”打算归国后与同人互相考证，编写提要。但是，赴黄冈教官任后，“同好者绝无其人，此稿遂束高阁。”然而远方的好古之士经常写信给他，索观书目。杨氏就旧稿中清晰可辨的，重新手录，厘为十六卷。这个《访书志》自然有很多书没有收录。从杨氏的序言中看，《访书志》成书于1901年，当时他在两湖书院任教，距他归国已有十七年了。

《访书志》收录的书，经部六十三种，史部二十六种，子部八十七种，集部五十九种，共计二百三十五种。以版本区分：宋刻本三十六种，翻宋、影宋、仿宋本八种，日本覆宋本五种，元刻本二十八种，明刻本五十四种，朝鲜刊本及活字本十六种，日本刊本二十三种，旧钞本、古钞本和影钞古写本或古刊本四十一一种，卷子本或影钞卷子本十四种，其他版本十种。

对数量众多的明刻本，杨氏并不全录所见，而是有所取舍。他说：“访古志所录明刊本，彼以为罕见而实我国通行者……，今并不载。亦有彼国习见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国翻刻旧本而宋西渡者，兹一一录入。”因而入载的明刻本也很有价值，如对某些书，杨氏就肯定明刻本胜于宋刻本。日本、朝鲜的刊本或活字本，大都源于古善本，和中土流行的同种书籍的其他版本相比，“异同叠见”，对校勘来说，有重要的版本价值。至于在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旧钞本或古钞本，有下列四个优点：（1）大都以古卷子本或古刻本为蓝本。（2）卷帙完整。（3）有些出于名人之手，被视为书法珍品。（4）有的书刊刻较少，长期靠钞本流传。因此，旧钞本、古钞本可以纠正后世刻本的失误，也可

以纠正一些刊刻过程中人为的窜改，在校勘中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胜过旧刻本。杨氏收回的卷子，数量虽少，价值却最大。六朝或隋唐卷子，远在宋刻之前。宋刻并非十全十美，某些讹谬一直为后世所因袭。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因苦无佐证，即行臆改。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卷子可以明确地判定是非，因为卷子更加接近祖本。一般来说，越早的古本越近真实。杨氏本人就利用这些卷子进行大量的校勘工作，解决了不少千古疑案。当然有些卷子，由于钞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讹倒衍夺，往往随处可见，但这毕竟是个别的现象，在《访书志》中所见不过一、二种而已。杨氏列举了《访书志》中急需刊布的书，如经部的《易单疏》、子部的台州本《荀子》、集部的《文馆词林》等数十种，以为“皆我久佚之籍，亦艺林最要之书，使汇刻为丛书，恐不在士礼居、平津馆下也”。这决不是虚夸之辞。例如，日本文化中林述斋刻《佚存丛书》所收的《文馆词林》仅四卷，中土即已惊为秘籍，杨氏在四卷外，又收集了十三卷半，显然大大地胜过了林述斋本。

《访书志》最突出的特点是记录详备，杨氏有下列一段中肯的解释：“前人谱录之书多尚简要，《敏求记》唯录宋本，《天禄琳琅》、《皕日精庐》、《拜经楼藏书》则兼采明本，时代不同故也，而张金吾论说尤详。余之此书又详于张氏，似颇伤繁冗。然余著录于兵燹之后，又收拾于瀛海之外，则非唯其时不同，且其地亦不同。苟不详书，将有疑其为郢书燕说者。且录中之书，他日未必一一能传，则存此崖略，亦好古者所乐观也。”志中每书提要，内容丰富，涉及作者、版本、卷第分合、内容品评等多方面，每书又各有重点，兼及其他。这确实是版本目录中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访书志》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详细记述了搜求海外遗书的经过，便于后人了解原书的流传情况。

杨氏每听说有部好书，便孜孜以求，多方购取。如南宋绍熙刊本《尚书注疏》二十卷，是最早的合疏于注的版本，中土早已亡佚。日本山井鼎在《七经孟子考文》中还提到过这个版本。杨氏到日本后，搜访很久，听说此书保存在大阪某收藏家处，就托人去买，往返四次，议价不成。等到杨氏归国时，道出神户，亲自乘船去了大阪，那人仍然居奇不售。杨氏想，此书是海内孤本，交臂失之，未免可惜，于是毫不犹豫地“破慳得之”。又如北宋刻本《广韵》五卷，为町田久成收藏。黎庶昌打算借出雕刻，无奈町田久成拒绝外借。杨氏听说他特别喜欢金石镌刻，就拿出汉印谱数种准备交换。町田久成果然垂涎不已，赶忙把书献了出来，这才把这部书刻入《古逸丛书》。再如，《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目录》一卷，原本藏日本纪藩竹田氏，嘉永年间（当清道光时）影钞了两部，一部藏枫山官库，一部藏医学。明治初年，医学一部散出。杨氏嘱咐杉本仲温全力搜求。过了一段时间，仲温果真把书拿来，然而要价极昂。杨氏想到此书的宋槧本在中土早就灭绝，而明程衍道刊本讹谬太多，不足为据，迫不得已，乃“忍痛得之”。

杨守敬熟知版本目录，精于版本鉴定，这使他能够买回许多特别有价值的罕见珍本。如宋槧本谢蘧《竹友集》十卷，镌刻精良，纸墨朗润，是“宋槧之绝佳者”。《四库提要》称当时的通行本只有四卷，而且有诗无文。《四库总目》著录的十卷本，是明谢肇淛从内府钞出的，流传非常稀少，数百年来，人们绝少知道此书。至于宋槧本，除明内府外从未见于著录。杨氏先借得此书，用西法摄照，后又用古钱币换回。他归国后，正好见到金山钱氏小万卷楼刊本，发现其中误脱不下数百处。如果杨氏得不到宋槧本，通行本的错误就万难更正。又如《太平寰宇记》，《四库总目》著录的是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云：“诸家藏本竟多残缺，惟浙江汪氏进本，所缺自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九卷，仅佚七卷。”

好象这个佚失七卷的本子，在当时已经令人满意了。杨氏获得了宋刻残本，补添了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卷。其中一百十四卷尾缺湘乡以下五县，又一百十九卷未能增补，仍然不是全书，但毕竟完善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在《访书志》中是不胜枚举的。

二、考辨版本源流，并通过校勘或版本对比，对版本优劣作出正确的评价。

很多重要的古籍，从唐以前钞本，到宋元明清刻本，代有传钞或翻刻，形成完整的版本系统。杨氏考辨版本源流时，除依赖广博的见闻外，更加以考证以前的目录记载。如王叔和的《脉经》，《隋志》和《新唐志》著录都是十卷，《旧唐志》却只著录二卷。由于此书收藏家很少，所以五代时高阳生的《脉诀》，得以托名王氏所作，直到元朝戴启宗辨误，才使真相昭然。在宋代，《脉经》一刊于熙宁，再刊于绍圣，三刊于广西漕司，四刻于濠梁何氏。元泰定间又刊于龙兴儒学。明代毕玉、袁表、沈际飞等刻本都源于泰定本。只有吴勉学《医统正脉》收取何本。阮元影钞何本，著于《四库未收书目》中，没有雕版传世。金山钱氏雕刻袁本，在质量上不如何本。这些情况，《访书志》中都有记述，为我们展示了《脉经》的版本全貌。

又如徐幹《中论》二卷，明弘治壬戌吴县黄纹原刻。嘉靖乙丑青州知府杜思重刊，沿袭黄本，书中多有墨丁。程荣《汉魏丛书》本源于杜刻，也有空格。到何允中重刻《广汉魏丛书》，就不缺字了。如《法象象》“夫以□□之困”，补“崩亡”二字。用《群书治要》校勘，知为何氏臆补。金山钱氏校刊此书颇称精审，却继承了何氏臆补的错误。杨氏依据所获明嘉靖本，明确地探寻出此书版本的演变踪迹。

杨氏不只条理了版本源流，更重要的是鉴别并指出了各种版本的精华和失误。例如唐太宗所撰《帝范》，国内早已亡佚，所以在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不得不从《永乐大典》中搜辑。

杨氏在日本得到康平年间(当宋仁宗时)刊本,经与《大典》辑本对勘,发现《大典》辑本除字句讹误外,还有数处遗漏了整个句子。四库馆臣不但未能订正,反而望文生义。如《去谗篇》“昏明之本”,《大典》辑本竟改为“为国之本”。“昭公去国而方悟”,是用宋昭公的典故,原注误引鲁昭公失国事而未加订正,又见“方悟”与实情不合,遂改“方”为“不”。凡此种种,杨氏都一一加以指出。

三、根据丰富的版本学和历史学知识,总结出鉴别古卷子的方法。

凡日本所藏的古卷子,大都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是中土钞写的,还是日本传钞的?杨氏除依据两国所产纸质的差异以及通过与现存实物的比较加以判定外,还在史实基础上,采用类比和推理等方法加以判定。如唐钞卷子《须赖王经》一卷,署“延历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右大臣藤原朝臣誓愿”。延历十六年,当中国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杨氏认为:“此卷盖其誓愿舍经,故记姓名年月于卷末,非必其所手书者也。”于是定为中土唐朝人手笔,理由是:(1)唐朝时日本“遣唐使”不绝于道,他们携回了大批唐人写经。日本天平十二年(当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藤原皇后施舍一切经全部,虽然不题唐人年号,但一望可知是唐人写本。

(2)右大臣相当于中国右仆射,藤原朝臣位长百僚,有能力布施,当时所舍并不只此一卷,只是其他的没流传下来罢了。(3)唐朝时,日本生产白麻纸,理松而纹皱,现存的嵯峨天皇(公元810~823年在位)等人的书可以证明。此卷子本却是黄麻纸,且相当坚韧,与中土保存的《郁单越经》、《转轮王经》纸质相同。(4)日本度藏的古钞本之多于中土,是因为日本兵争,例不毁佛寺,千年古刹,崔巍相望。又中土禅宗盛行以后,三藏书籍都束之高阁,日本僧徒虽也沾染流风,但梵夹经典一直在诵习。杨氏根据以上四点来加以论证,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样就使

唐写本《须赖王经》成为定论。

四、根据卷子、古钞本和古刻本，订正古书的讹文、前人的舛谬和著录的错误。

杨氏收集古本旧刻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发现和解决一系列新旧问题。如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隐公九年传》：“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注：“祝聃帅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后伏兵，起，戎还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后及中三处受敌……”《校勘记》云：“山井鼎云，足利本‘遇’后人改作‘过’，非。”杨氏校以影钞古卷子本《春秋左传集解》，“遇”正作“过”。杨氏认为这是一字千金。他进一步解释说：祝聃引戎师超过二伏兵，到后伏兵处。后伏兵起，戎师败退。二伏兵御其前，后伏兵击其中，祝聃回转而逐其后，所以说戎师三处受敌，情景如绘。如果开始就遇见二伏兵，戎师或斗或退，怎么可能继续随从祝聃到后伏兵处？杨氏论断精当，足以服人。证明山井鼎并没有见到古卷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案断是错误的。

又如日本古钞本经书注中常多“之也”等字，阮元说是日本人加的，日本森立之说是隋唐旧迹。杨氏发现唐时钞本很多虚字，至北宋删除了不少，到了南宋则剪裁了十之八九，这就与森立之的说法相应。杨氏通观了各种钞本（不只是古钞本），得出了切合事实的结论：古钞本因注文双行，难于均齐字数，往往在对行悬空数字处增添虚字，因而所增之字总在句末，而且各钞本不尽相同。在注中的虚字因原本相同，各钞本也相同。经文则毫无增损。证明阮、森两家说法各执一端，都不尽正确。

杨氏根据古本订正前人著录的错误也所在多有。仅就《四库总目》来说，订正就有几十条之多。杨氏研究了宋本《大唐西域记》，指出此书是玄奘译文，辩机润色，纠正了《通志·艺文

略》分玄奘和辩机为二书的错误。元槧巾箱本《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明确无误地题着元刘应李撰，订正了《四库总目》题宋人撰的错误。元槧本《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文集》二卷，首有元大德癸卯刘将孙序，据序得知此书是高楚方编。明代白阳山人等所刻都本于元本，但遗弃了刘序，以致后人不知编者为谁。《四库总目》依据明本著录，云：“不著编辑人名氏”。虽然怀疑此书即高楚方编，但并无确证。杨氏根据元刊本刘序，补正了《四库总目》的不足。

五、揭示了《古逸丛书》中某些书的来龙去脉。

《访书志》中十种书被刻入《古逸丛书》，杨氏在提要中对刻书情况时有记述。如黎庶昌让他的女婿张某影写了宋本《尚书释音》二卷，打算雕刻。杨氏则认为此书原藏于武昌张廉卿处，并非得自日本，况且不是陆德明原书，而是宋人所作，不宜收入《古逸丛书》。黎庶昌听了大为骇异。杨氏随即查阅《崇文总目》、《玉海》等书，证明本书是宋开宝中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因陆德明依《古文尚书》释音（按陆德明所据者实为伪《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文字上与唐明皇所定的《今文尚书》驳异，于是诏令陈鄂依今文释音，而废弃了陆德明原书。清儒段玉裁、卢文弨对《释文》中这两卷早已深表不满。杨氏认为：如果得不到开宝以前的古本，仅凭这个是不足惊人的。但是张某一定要刻，杨氏“未便深拒”。要不是《访书志》记下这段故实，我们是很难了解其中真相的。

又如宋刻本《广韵》五卷，是张氏泽存堂刊本的底本。原本谬讹不少，张氏校改之功不可灭，但也有本来不误而改错的，有显然失误而未校出的，有应当存疑而径改的。杨氏打算刻此书时全依宋本，用以表明张氏校改的功过，但黎庶昌一定要依张本。

《古逸丛书》都是杨氏一手审定，只是此书和《老子》的札记，是黎庶昌根据杨氏校本自己写作的。

上面所谈的，只是《访书志》几个重要的侧面。此外，《访书志》还如实记录孤本秘籍的版式与结构，考证撰人的姓氏、爵里，为后人著录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并按照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客观地评论图书内容。总起来看，它是一部高质量的版本解题目录。它的贡献，不止著录了二百三十余种濒临灭绝的古籍，更重要的是著录了这些古籍的基本面貌，为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判断版本源流未必尽当。如《方輿胜览》七十卷，杨氏认为此书只有宋刻本，“元明以下均未重镌”，实际并不如此。鉴定版刻也有失误之处。如古钞卷子《春秋左传集解》，杨氏定为六朝钞本，但杨伯竣先生证明是隋人写本。又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指出，《访书志》著录的各种佛经卷子，大半是近百年内高丽旧钞，并非隋唐和六朝时旧籍。可见《访书志》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尚有待于根据实物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王重民先生在1926年至1927年间辑有《日本访书志补》，新增经部十七种，史部五种，子部十三种，集部十一种，凡四十六种。其中以明本居多，其次钞本和宋元本。古籍的四部分布和版本的多寡情况，与《访书志》极为相似。为了全面评价杨氏日本访书的贡献，这个辑补有一读的必要时。这里就不多谈了。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